

II MAN LUN

# 漢唐文史漫論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# 汉唐文史漫论

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部 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韩济平

封面题字：施邦华

汉 唐 文 史 漫 论

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部 编

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礼泉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4.75 插页 字数300,000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560 定价：3.05 元

## 编 者 的 话

编辑这本《汉唐文史漫论》的目的，在于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，批判继承汉唐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剔除糟粕，吸取精华，以建设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。

本书收入三十多篇文章，既有专题研究，又有评论考证，还有鉴赏介绍；内容涉及汉唐社会历史、政治经济、文学艺术、哲学宗教等，对广大读者了解汉唐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。

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部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

# 汉唐文史漫论

- ( 1 ) 论西汉文景之治和先秦黄老思想…………… 朱宝昌
- ( 30 ) 徐福东渡考略…………… 秦 人
- ( 42 ) 汉唐长安城建筑设计思想初探…………… 何汉南
- ( 59 ) 汉唐风物杂考…………… 万曼遗作
- ( 76 ) 唐田令释要…………… 汪篈遗作
- ( 85 ) 论魏徵…………… 姚澄宇
- ( 99 ) 开元名相——姚崇 附：《“十事要说”考》…………… 胡 戟
- ( 123 ) 孙思邈生年考…………… 邓 剑
- ( 128 ) “天地可以别构”…………… 路 工  
——介绍谭峭的《化书》
- ( 138 ) 禅宗述评…………… 罗 炤
- ( 167 ) 玄奘与《大唐西域记》…………… 高 扬
- ( 179 ) 唐太宗诗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初探…………… 杨 柳  
——兼论其对唐诗发展的影响
- ( 195 ) 试论唐诗繁荣之原因…………… 武复兴
- ( 210 ) 唐代通俗文学初论…………… 张锡厚
- ( 252 ) 论《全唐诗》之主干及其他…………… 张步云
- ( 277 ) 《远别离》雕龙…………… 安 旗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(288) 房琯事件与杜甫后期的生活及创作····· | 邓魁英     |
| (311) 为“一德兴亡”而“冒死称述”·····  | 马连儒     |
| ——论杜甫疏救房琯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(328) 杜甫的病、药及诗风·····       | 钟来因     |
| (346) 白居易的寓言体诗·····        | 周乃昌     |
| (357) 元白次韵诗新探·····         | 卞孝萱     |
| (372) 中唐社会生活的一个窗口·····     | 韩望愈     |
| ——刘禹锡诗歌漫评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(380) 论花间词·····            | 张式铭     |
| (413) 月是唐代明·····           | 董冰竹     |
| ——谈唐人描写月色艺术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(424) 玉辇何由过马嵬·····         | 霍松林     |
| ——马嵬诗漫谈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(440) 古剑谈略·····            | 王学理     |
| ——由秦王剑说起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(465) 西安游展 八首·····         | 刘逸生     |
| 封三：唐诗名句篆刻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文水 青羊篆刻 |

# 论西汉文景之治和先秦黄老思想

朱 宝 昌

成书于战国时、出乎老子后学之手的“五千言”，就其内容来看，可以说是一部出色的“资治哲学”。老子谈话的对象是帝王，旨在告诫为王者应如何才能保持住帝王高高在上的宝座；至于怎么打天下，得天下，他一字未提。先秦时候，老子思想一直在水边林下传播。时至汉相曹参始登上庙堂之台。曹参继萧何相汉惠帝，没多久就死了。接着惠帝驾崩；接着便是诸吕之难、宗室及大臣诛诸吕。

文帝（恒）登位，乃以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王子，从代王的位置上被汉室大臣迎到长安来作汉帝国的皇帝<sup>①</sup>，始以帝位之尊位与柱下之史打起交道。未尝不可说，在中国一部二十四史中，汉文帝是柱下史唯一的一位天子门生<sup>②</sup>，而且是十分忠实于柱下史的一位天子门生。

本文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看法。

## 一 文景之治与黄老哲学

汉文帝即位时，正值汉帝国全盛之世，但盛世之背后确实还有着许多重要问题亟待解决。且看：关东清除了一批异姓的诸

侯后，另换来了一批同姓的诸侯，其为不安定因素则一。北方有正值全盛的匈奴硬对，东北有高丽，南方有南越，自吕后时便闹独立。还有天字第一号的农民问题根本未解决。此外，对待商人的政策，高祖在时，百忙之中瞧着他们总觉心头有气：

“汉八年，下令贾人毋得衣锦、绣、绮……操兵，乘、骑马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十二及班书《食货志》）这能解决什么问题！还有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，即自由的问题，亦有待调整解决。

这一系列存在的问题，都摆在这位二十三岁的皇帝面前，怎么办呢？

文帝即位前，受教育的情形史无记载。他受封为代王是在高皇诛灭陈豨后，这时他只七岁。虽然他的母亲薄姬是个很不得宠的妃子，这并非由于她姿色容貌不如人，乃是莫明其所以然的高皇把她忘却了（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），当然她生的儿子也就不太得宠了。可是高皇肯定希望他速能长大成人，成为高皇和他的嫡嗣的得力助手<sup>③</sup>。因此估计青少年时代的文帝一定受到了当时培养王子的正常教育的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当时宫廷内吕后和戚夫人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，不能不给文帝母子俩以心理上、精神上很大的刺激，并作用于文帝母子观察事态的思想方法和态度。宫廷斗争给他们的影响，付多少学费，投多少名师，读多少古典，游历多少名山大川，也难受到这样深刻的教育。

绝妙的是：他母子俩既置身事外——因薄姬当时欲求党于吕氏或戚氏均不可得，哪一方胜利对她母子有利，无法预测；而分明又在局中——她们俩又不能不关心这场斗争，这是她们的家务，她母子俩又是这个皇族的成员，却使不上劲，没有发言权。



她们俩处在这样微妙的境地下，其操心也微，其虑患也深，她们俩无患得患失之心，故能在处事态度上比较冷静，思考问题比较客观，就宜于运用理智寂寞地无私地静观。这就是所谓孤臣孽子所处的地位，而最有出息的人往往从此中出。

俟高皇崩后，戚夫人母子被吕太后极残酷地处死。其他妃妾，因高皇生前对她们施甘恩宠，今又概囚在宫里以发泄太后对她们的愤恨，惟独薄后以希得招幸故，吕太后恩准随其子代王之代，为代王太后。其弟薄昭也蒙恩准一同去代。（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）他们作为皇族的一枝，就只这三口亲骨肉。单这件事，足以令身处其境的母子俩深思而感叹不置。长期的寂寞，被高皇遗忘，倒楣，分明完全是幸福的伪装。（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注解3.39）曾几何时，谁料想到弹指间，吕太后气焰万丈，戚夫人红极一时，而今皆如雁过长空，影沉秋水④，归根结蒂长乐宫乃成薄太后养尊处优之所了。世事之茫茫不可测竟如此，好象真有如《浮士德》中的麦菲斯朵夫角色一样，现恶魔身，意在作恶，而又总是创造了善。

到了吕太后身后，诸吕欲为变乱时，宗室跳得最积极的是齐哀王和其弟有名的朱虚侯。哀王是高祖的嫡长孙，他想到长安来做皇帝本没有什么不合理。（班书《高五王列传》）代王母子在代安于北藩，对在长安发生的事不动丝毫声色。既诛诸吕之后，大臣们一致认为齐王“母家驷钧恶戾，虎而冠者也。方以吕氏故，几乱天下。今又立齐王，是欲复为吕氏也。代王母家薄氏，君子长者。且代王高帝子，于今见在，最为长。以子则顺，以善人则大臣安。”大计就是这样定了下来。齐王外婆家强有力，代王外婆家门衰祚薄，结果是好事变成坏事，坏事反成了好事。

大臣们这样决策，决非有所爱于代王，亦非有所憎于齐王；更未想到汉帝国的百年大计。这时，立嗣的大权理所当然地在他们手里。他们主要是从自身的安危这一自私自利思想出发，但和汉帝国的利益也恰恰误打误撞地相符合。故文帝得继承大统，他自己未动一点脑筋，未出一点力气。他也未曾指望做皇帝。正如朱元璋做了皇帝后说：“孤始愿不及此，今及此，岂非天乎？”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以上，文帝母子在那非常时期的一系列的遭遇，都极深刻地教训了他。使他相信：天下事与事、物与物之间自有其一定不移的关系。做帝王的人也是天下万事万物中之一物，并不特殊。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高踞于万事万物之上，而不受一定关系的约束。齐哀王一心想继乃祖的大统而不得，他自己全无心于此而得了。这是值得深思的。对大臣们不必脱离现实去过多地希望他们对君王的忠诚。那些人，无论谁，总是首先考虑他自己的问题。当忠于君王又符合他们自身利益，或至少对他们无危害，他们自然就会尽忠，无待于教导，更无待于鞭策。这更是值得深思的。总之，这位君王不是个英雄人物，他没有成为英雄人物的那些条件。他虽生于深宫之中，不平凡的戏剧性的环境使他成为一位能深思的哲人。

对文帝的治天下，明末大思想家王船山归纳为一个“忍”字，一个“让”字。（王船山：《宋论》太祖章）他说：文帝能忍人之所不能忍，能让人之所不能让。我再补充两句：文帝是无往而不忍，无往而不让。他为什么会如此呢？面对高皇身后留下的一系列的问题，根据他母子的亲身经历，他感到除去忍和让，别无下手处。怎样对付也不会合适。船山也指出：这纯粹是道家的老学。船山的论断实在精确无比、深刻无比，是读

透了五千言后，对文帝治天下的方术的最高度的概括。为什么要忍呢？五千言中说：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刚。”又说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己者强。”这话等于说：真正强有力者是最善于作自我斗争的人。一贯伸拳头的决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又说：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读这一系列格言，如嚼橄榄，越嚼越觉意味无穷。这是帝王教科书<sup>⑤</sup>。

《史记》律书记文帝元年有一位将军主张对朝鲜和南越用兵。文帝说：“朕能任衣冠，念不到此；会吕氏之乱，功臣宗室共不羞耻，误居正位，常战战栗栗，恐事之不终。且兵凶器，虽克所愿，动亦耗病，谓百姓远方何？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，故不以为意，朕岂自谓能？今匈奴内侵，军吏无功，边民父子荷兵日久，朕常为动心伤痛，无日忘之。今未能销距，愿且坚边设候，结和通使，休宁北陲，为功多矣。且无议军？”

（《史记·律书》）

此即以忍为下手处，由此便派生出谦、慎、慈、俭一系列的美德。老子的三宝这里都有了。老子的军事哲学这里也有了。不同于儒家的孟子，还分别什么义战与不义之战。即便是义战也是不打最好，打胜了也不如不打。

越忍越让，蓄积的力量便越大。这不是儒怯，不是阿Q。文帝深懂：即便是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他的权力和利益既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百分之百的绝对。如果是作为天子的对立面的另一方，势必连立锥之地也无，而到了这一步，尊君论者势必仍以为未足，因对立面还有个锥子在。当你的对立面正在踌躇四顾觅地立锥之时，尊君论者还会跑过来对他说：“你倒不如干脆把个锥子也献上来吧！你赤条条一丝不挂，四大皆空，这倒是条成佛的路。”到了这一步，你的对立面不一起上来先

把你送到地狱里去，才叫做怪事！这便是暴秦所走的道路。尊君尊到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，十公主砣死于杜，财物入于县官（既中央政权），相连相逮者不可胜数。可气又可笑的是皇帝要那么多财物干什么。一弹指之间，霸王来了，一把火，可怜焦土！（参看《史记·李斯传》）

尊君尊到最后，必然搞全面奴隶制，这是逻辑的必然。这不但是最大的罪恶，同时也是最大的愚蠢。在秦始皇以前，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人实行专政的普遍奴隶制的政治制度。（参考《历史研究》80年第3期林志纯：《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》一文）

文帝对秦之所以亡，汉之所以兴，是十分清楚的。这是他一生最感兴趣的问题。（参看《史记·张释之传》）他以忍、让治天下，只要求天下承认一条：皇帝必须姓刘，是高皇帝的子孙；此外，无事不可商量。他以忍、让，以清静无为作为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消毒剂。君权是绝对的，是至高无上的，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这里，但他按兵不动；他不动，于是谁也不敢随便乱动。这便叫做以静制动，这便叫做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。他一不以搏击为能，二不使阴谋暗算，只是一味没有气力，不使劲。

早在吕后时，南越王赵佗便自称南武帝，在边疆上生事。（班书《高后纪》）文帝写了一封信，带了点轻微礼物，派大中大夫陆贾去南越，向南越王致意问候。信开头第一句便是“朕高皇帝侧室之子，弃外，奉北藩于代”，遭诸吕之难，大臣才迎他来长安，立为皇帝。接着便说已派人去真定存问赵佗的亲故，修治赵佗先人的坟墓。（赵佗是赵国人，老家在赵国真定。见班书《南越传》）接着便说赵佗在边境上生事，对汉对南越都有

害。再接下去便说赵佗称帝彼此不便，不好互相往来，特派陆贾来传达皇帝意思。毫无气力，毫无锋芒，也未要求赵佗答复表态。问题解决了，赵佗上书谢恩请罪。

从文帝临崩时的遗诏看，他对坐在皇帝宝座上的确并不感到是件多么舒服的事。秦二世皇帝、秦王子婴的下场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。从绝对权力转化为零，乃至为负数，只在一刹那一反掌，因所谓绝对权力本是件莫须有的事。秦王子婴有什么罪恶呢？落在项羽手里还不是求为匹夫而不可得。他为什么当上皇帝呢？大臣们拥护他并非因为他有何功德。因此，他对于摆皇帝臭架子实在感到无聊，而且危险。故而对赵佗这个跳梁小丑，他心里一点也不生气，故应付得那样从容不迫，游刃有余。他并不是行什么仁政，而是他认为当皇帝就应该这样当。王船山说：“以法治天下，则下甚劳而上甚逸。以道治天下，则下甚逸而上甚劳。”（《读通鉴论》论秦二世）这两句话分别用在始皇父子和汉文帝身上，可谓丝毫不爽。文帝在位二十余年，其心甚劳，其心甚苦。他身体一直不健康。遗诏说：“朕获保宗庙，以眇眇之身，托于诸侯王之上，二十有余年矣。赖天之灵，社稷之福，方内安宁，靡有兵革。朕既不敏，常畏过行，以羞先帝之遗德。惟年之长，惧于不终。今乃幸得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。朕之不明与？嘉之，其奚哀念之有？”（《汉书·文帝纪》）

临崩时大有如释重负、如归故乡之感。不但不象燕昭王、秦始皇以及乃孙武帝求长生不死，而且也不稀罕健康长寿。不深有得于柱下，他对生死能这样潇洒么？做皇帝对他是个什么滋味，不也可窥见一斑么！

吕后元年，下令除三族罪、妖言令<sup>⑥</sup>。这政策落实不下

去。文帝元年五月诏曰：“……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，是使群臣不敢尽情，而上无由闻过失也，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？民或祝诅上，以相约而后相谩。吏以为大逆。其有它言，吏又以为诽谤。此细民之愚，无知抵罪。朕甚不取。自今以来，有犯此者，勿听治。”

十四年，他听到祠官祭鬼神时，都是为皇帝祝福，便赶忙制止，他说：“朕甚愧愧。夫以朕之不德，而专乡独美其福而百姓不与焉；是重吾不德也。”（班书《文帝本纪》）这难道不是他的真情实感？

他是个今上皇帝，他总不能叫宗室大臣及士大夫老百姓都不要尊他。只是他心中雪亮：不管人们喊尊君喊得怎样震天价响，无非都是迫于势；在那个制度下不喊不行，不尊不行。可是，当高皇率十万义兵进入关中后，连赵高也不尊君了。他杀了二世，立了王子婴，又想杀王子婴，尽灭秦族，去投降高皇，立功赎罪（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）。这该多么可怕啊！所以文帝胸中自有智珠，他认为愚民百姓在下面哪得不有些闲言语，乃至咒诅。至于诽谤和妖言间怎样划界，李斯、赵高之流也未必能说清楚。还有那刀笔吏为了表示他们忠君尊君，则执法惟恐不严。这正如宣帝时路温舒在其有名的论文中所说：“治狱之吏，多欲人死。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，在于人死。”（班书《路温舒传》）文帝看清了此中积弊。秦亡首先是亡于李斯，其次是亡于赵高。这都忠君论者的骨干人物。再其次，便是亡于“多欲人死”的刀笔吏。

文帝六年，发生了淮南王自杀的事件（班书《高五王传》）。这是一幕悲剧。文帝十二年，民有作歌刺文帝者，其词曰：“一尺布，尚可缝；一斗粟，尚可舂，兄弟二人不相容。”文帝听

到后，叹息。

文帝对这个小兄弟是溺爱，骄纵，当他犯了法后，仍是委曲求全，想保全他。史书俱在，可以复按。这首讽刺的歌，应该说与事实有出入。但是，这反映废诽谤妖言罪的诏令的确落实了。所谓与事实有出入，这就看对这句话怎样理解。文帝和淮南王之间，确发生了矛盾，淮南王在受到严厉处分后自杀了。这都是事实。至于责任，应在淮南王。文帝处理他不过是吓唬他一下，不久仍要恢复他的王封，这作歌者怎能知其底细呢？作歌者凭一时感慨，即便对文帝微有讽刺之意，当然也应该言者无罪。民间的歌谣并不是法官的判决。

刘邦在时，曾命萧何制法律，张苍定章程和韩信申兵法。汉帝国是有一部法典的。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廷尉，这个人很严肃，是个很好的法官。但是，在那个制度下，不管法官如何好，还要看皇帝的态度。皇帝的地位是超乎法律之上的。

以下两个事例说明了很重要的问题。

一次，皇帝御驾出行，经过一座桥。有一个人从桥下走上 come，惊了御马。把此人送廷尉审讯，无任何情形，确系良民，廷尉依律判此人当罚金。文帝发怒了，认为判得太轻了。释之说：“依律只能这样判。当时皇上如吩咐立刻置之于死，也就罢了。既不，交到廷尉，我便只能这样判。如果判重了，今后遇到类似案件怎么办？同样案情，有时判重，有时判轻，老百姓这日子怎样过？一部法典还不等于零！”文帝考虑良久，才说：

“你判得对。”（参看《史记·张释之传》）

从文帝考虑了良久，看出他作了多艰苦的自我斗争。他克服了自身的弱点，取得了思想斗争的胜利。文帝到底是强有力者，堪称“哲学王”（Philosopher King）。

又有一次，有人偷了高庙座前的玉环，捕获了，交廷尉办。释之判了他死刑。“哲学王”大发雷霆说：“这该灭九族。”释之说：“依律只能这样判。假如灭其族，万一有个愚民‘盗长陵一抔土’（挖掘刘邦坟墓的礼貌语言），陛下又将何之处之？”文帝最后也只得承认他判得正确。（同上书）

文帝一生显得心不平、气不和，据史册记载，有这两次。一次是涉及他自身的安危，这时他大概想起他毕竟是皇帝；另一次是涉及高皇身后的尊严。这说明胜己毕竟不易。然而就这两次事件，他也还是承认了法律的尊严，他没有利用万人之上的特权，越过廷尉自己处理。这也该算难能可贵了。

## 二 文帝与贾谊

文帝和贾谊的关系，也要算历史上一个公案。

谈这个问题，不妨先从苏东坡谈起。

东坡一生最佩服两个人：一个是贾长沙，另一个是陆宣公。他也隐隐以这二人自况。现当然把陆宣公丢在一边不谈。

读东坡写得《贾谊论》，可以不客气地说：他既不了解文帝和贾谊君臣之间的关系，也不了解汉家当时的政治形势。文章的主要论点是：汉文帝是三代后难得的贤明之君，而贾谊则是历史上难得的王佐之才。贾谊该见用于文帝，该成就一番空前绝后的事业；而事实上偏偏不曾，他不解，于是非常惋惜，于是写了这篇论，于是论来论去，论不出一个所以然。

东坡是个有大才气的文人（man of letters），大到使闻一多认为他之所以不能成为第一流的诗人，正是为才气所累。他诗、词、书、画，样样精通，小品文也颇可观赏，论到王荆



公的三经新义也能击中其弊，因他精通文艺。可他根本不能论史，毫无见识，徒有辩才不行。

贾谊是洛阳人。据《史记·贾谊传》：“年十七、八，以能诗属书闻于郡中。吴廷尉为河南守，闻其秀才，召置门下，甚幸爱。孝文帝初立，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，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师焉；乃徵为廷尉。廷尉乃言贾生年少，颇通诸子百家之书。文帝召以为博士。……超迁，一岁中至太中大夫”。《史记·本传》只保存了他一篇《鹏鸟赋》和另一篇《吊屈原赋》。这并不说明史公认为他的政治论文无价值。《史记》著书的体例，只保存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。《汉书》则在《贾谊传》及《食货志》中收录了贾谊有关政治和经济的丰富材料。他活了三十三岁，便因自伤不得志郁郁而死了。

贾谊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他的学问是什么路数呢？对他的所谓不得志该怎样理解呢？不成问题，他是个天才磊落英俊的青年，兴趣广，知识面也广的多方面人物。他不但对现实政治有兴趣，对当时政治上的重大问题有他自己的系统性的看法；他对文学也喜爱，故过湘水时，感怀身世，作赋以吊屈原。他的哲学思想绝不是个庸俗的实用主义者（Pragmatist），对一些带有永久性的根本问题也有他的相当精致的看法。他生值汉初挟书律已废除之后，自然是如饥似渴地求书，废寝忘食地读书。否则无法解释那样年轻，便积累了那样丰富那样有体系的知识。还有一说，我们也不要相信秦王朝的挟书律便真是对每一个人都那样“天威不违颜咫尺”。宋人诗说得好：“谤声易弥怨难除，秦法虽严亦甚疎。夜半桥边呼孺子，人间犹有未烧书。”任何暴君的苛烦的政令，实质都是无事自扰，自搬砖头打自己的脚。在二世未死于望夷宫之前，天下书籍无疑久已在